

我爱知识,我更爱教育

——访著名财政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樊丽明教授

●本刊记者 阮 静



“成功无法复刻,幸福不能模仿,‘白富美’和‘高富帅’绝非人生唯一的模板。希望你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媚世俗,不弃梦想,踏踏实实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这是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在2013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一段寄语。就在大约一年前,这所近百年的老校迎来了校史上第一位女校长——樊丽明。在这次毕业典礼上,樊丽明校长亲自为3610名毕业生逐一颁发证书,并亲切地与每一位毕业生合影留念,在采访过程中笔者谈及这一场景时樊校长说道:“我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改进我们的工作,让学生感受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爱”,樊校长还说“持续改进”是她特别欣赏的一个词。

与樊丽明校长交流了近两个小时,笔者真切地感受到樊校长是一个效率极高的人,事无巨细,用心用情,所以生活得坦荡饱满,且在“不经意”间人生就达到了某一个高度。这种效率不仅体现在女性教育工作者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之道,仅就采访樊校长的当天,那安排满满的日程表以及樊校长的工作状态已让笔者心生敬意——从市里开会回到学校已是下午一点钟,简单一个盒饭解决午餐问题后,两点钟开始接受笔者采访,紧接着接待了一位校友、主持参加了学校的两个会议……这是这位校长履新一年后在暑假当中一天的工作安排,但其在采访过程中毫无疲惫之态,说话抑扬顿挫,思路清晰流畅,表达逻辑严密,既彰显出一名财政学者严谨治学的素质、一名教学管理者扎实处世的作风,又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一股积极生活态度的“正能量”。

一天如是,几十年亦如是。正如樊校长所说“在我的印象中自己好像从十几岁下放至农村到上大学起学习、工作就一直这么忙,一直没有停下来,也不会享受……好在工作给了我‘享受’的感觉。”

樊丽明,1958年生,山东高青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公共经济理论、财政税收政策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兼任教育部财政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历任山东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山东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等职。在七月酷暑的上海,笔者有幸专访了樊丽明校长,了解到这位财政学者因对知识的热爱而勇攀学术高峰的治学经历,聆听到这位大学校长因对教育的热爱而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校园里的感怀心声。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成长在文革期间,得益于改革开放”

“伤痕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出现直接起因于十年文革期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年代的悲剧性遭遇。与现在很多中年学者一样,樊丽明就成长于“伤痕文学”所描述的动乱年代里。“我在78年上大学以后也读了很多伤痕文学的东西,他们一般都是在控诉,于我而言,我还是很庆幸有这样两年半的插队经历”。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控诉”基调,在谈及这段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时,樊丽明用了“庆幸”一词。

1975年被下放至淄博市周村区的农村,由于当时年纪小,插队时间不长,且插队的地方离家不远,社会整体状况不再那么动乱,所以那段经历在樊丽明看来并非“苦不堪言”——“当时我和同伴举着红旗,徒步三十多华里到插队的村子,从学生转变成了农民。但像农民一样生活劳动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学生来讲,那种劳动强度和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也不必多说。我所说的‘庆幸’是因为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段经历中三秋三夏在大田里干活、缺少睡眠、考验体力的艰苦劳动樊丽明并没有过多回忆,反而她绘声绘色地谈起“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适宜”诸如此类反映节气跟农活关系的谚语,“你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历了一轮粮食的耕种、做了所有的农活才明白这些谚语的本意、才真正掌握节气和农活的关系,所以我想未来退休后很可能去过一种田园的生活,到时候真得很充实,”这种讲述颇为轻松,但也只有扎扎实实地经历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经历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且对自然心怀敬意的人才能说出这番话。

社会底层的生活劳作对于培养一个人的意志力、韧性与坚持无疑是最生动有力的课堂,樊丽明自己也认为正是吃过这种苦让自己在后来的生活中不畏苦、不怕难,同时也正是知青生活让她在年轻的时候初步建立了对于立体社会的认知,尤其培养起对于中国农村的关注、对于底层社会生存状态、生产模式、思维方式的理解包容,“这对我后来学习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帮助太大了。”

而这段经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年轻的樊丽明发现了的职业兴趣,激发了其从事教育的想法。“我很庆幸在这期间有一年做民办教师的经历”,樊丽明说道。当时村里缺一小学民办教师,生产大队干部认为樊丽明写字、谈吐等都颇像老师的样子就让其担当了这一职责。一方面是教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教室学习的复式班教学任务,另一方面是语文、数学、常识、音乐、体育等多课程备课授课的挑战,“尽管条件艰苦,要求也较高,但我还是动脑筋想办法让学生乐于学、学得好,结果是学生们挺喜欢,家长也很欢迎。”因此这一年的经历让樊丽明发现做教育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己也适合这一工作,“从此我对从事教育工作就有了那么一种向往。”

意志力的锤炼、立体社会的认知、职业兴趣的启发对于年轻人品性的磨砺、心智的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的把握都会有一种预科式、启蒙式的作用,樊丽明所言“庆幸”莫过于此,而她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可能对于人生的起承转合更有总结式的意味:“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成长在文革期间,得益于改革开放”,如果说这段知青经历是一次历练和体验,是人生阅历的一抹底色,那么对樊丽明而言真正的“转机”则是改革开放后高考的恢复以及大学之门的敞开。尽管当年下乡时每



与学生一起



赴基层调研

天有着高强度的劳动,但是《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红旗》、《人民文学》、《诗刊》等报纸刊物到知青点时,年轻人那种疯抢阅读的状态还是让她记忆犹新。而这背后压抑着的文化饥渴和求知欲望似乎就在这高考恢复的瞬间点燃。樊丽明清晰地记得报考前后的诸多细节,包括恢复高考信息传来时奔走相告的欣喜、找寻复习资料的艰难、准备时间的紧迫、填报山东大学的想法以及高考后又获得返城机会去蔬菜公司做售货员的经历等等,笔者不禁感叹从77年冬天到78年初最终去读大学,当年的樊丽明在极短的时间内既参加了高考又完成了从农民到售货员再到大学生身份的转换,经历着实丰富,尽管有人说知青岁月就是“两眼一抹黑、看不清未来”的日子,而在时代转型的当口,有能力抓住一些机会、走稳几次跨越,人生的佳境可能就渐次展开。而对于考上山东大学这件事,樊丽明则谦虚地说道:“我也只是属于那个不读书的年代稍微读了一些书的人。”

经济学的殿堂里打开财政学的大门

1978年3月4日,樊丽明到山东大学报到,这是此次采访过程中仅有的一次明确到日期的讲述,似乎也说明着这一天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之所以说‘得益于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我们读大学的机会,但就是从读大学的那一天起,你就知道你面临的是非常艰巨的读书任务。”樊丽明就读于山大政治经济学系,选择该专业主要来自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一生从事银行工作,母亲前半生在银行,后来转做财政工作,在她印象中家里箱底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苏联版本译著,“所以报考政治经济学可能受到这种潜在的影响吧”。一旦开启了一门专业系统性的学习,那种如饥似渴、几无喘息的学习状态便又浮现在樊丽明的眼前,“那个时候,除了上课就是在上自习,就是天天学习,当时班主任都到教室里说‘你们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出去出去,赶紧去锻炼’,老师都在赶大家,就是这样一种学习状态。”可即便是这样学习了四年,樊丽明依旧觉得“没学够”、“知识的基础根本无法适应未来工作需要”,于是复习考研又成为她的“不二选择”。由于文革后研究生制度刚刚建立,不仅招考规模极其有限,是否招考也存在不确定性,樊丽明本科毕业当年山东大学就无招考计划,还是在他人的推荐下选择了报考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系,于是从82年冬天自山大毕业很快就“转战”武汉到了中南财大开始了硕士阶段的学习。由于专业转为财政学这一更加强调应用的学科,与之前所学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理论极强的学科在专业体例上存在不小差别,所以硕士阶段的学习对樊丽明来讲也颇为艰巨,“一方面在补一些诸如会计类的课程,另一方面还要跟上硕士阶段本就紧张的课程安排”,就是在这种边补边学以及高强度的课业压力下,樊丽明拿下了硕士学位。

“所以回头来看,从本科到读研,我这七年的学习实际上是一口气下来,节奏很快,就是一堂课一堂课听,一门课一门课学,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来,而且本科跟读研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隔,所以七年基本上是一以贯之、一口气下来。但是收获真的非常大,”樊丽明这样总结道。

而具体谈及这一阶段学习的收获,笔者感受到了一份溢于言表的感激。一方面樊丽明“特别感恩山大”——山大将她引入经济学殿堂,奠定其比较扎实且受益终身的经济学基础;山大以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让她始终有兴趣“用眼睛的余光”去了解其他领域诸如文史艺术方面的知识,且始终葆有对“自然科学的敬畏感”;山大的学风赋予她朴实做人、扎实治学的风格,“谁都不敢不懂装懂、不会说会”。另一方面中南财大专业教育的风格则给予她“完全不同的收获”,亦是受益至今——财政学专业的学习奠定其学术发展道路的基础和方向;注重调查、强调学以致用理念赋予她“关注现实、关心中国”的治学风格;而严格的科研训练则培养了她今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能力。她记得山东大学马家驹老师用一年半的时间为学生讲授《资本论》的情景;也记得中南财大彭澄老师的西方财政学课堂上让学生读原著、翻译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并当场点



评的教学方法以及在河南五市调研时梁尚敏老师让她连夜撰写文章的“魔鬼训练”……

在经济学的殿堂里打开财政学这扇门,是樊丽明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在财政学领域取得成绩结出硕果,则需要推开这扇门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一步步地深耕细作。1984 年底硕士毕业,樊丽明应学校安排留在中南财大任教,此时的她刚刚结婚,先生则远在山东工作,“一方面是学校需要,另外中南财大学术氛围好,当老师也与我的志趣吻合,所以当时就决定先留在武汉工作”。然而与先生长期异地工作毕竟是个问题,而此时母校山大因筹办财政学专业亟需师资,力邀樊丽明回校任教,因此在结束了中南财大三个学期教学任务后,1986 年 9 月份樊丽明回到山大,开始了与母校财政学学科建设共同成长的历程,亦是其个人学术不断精进的肇始。

学海无涯“努力”为舟

从财政学、西方国家财政、财政政策学等多门课程的讲授,到担任干部专修科班主任、经济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回到山天后一心一意为办好财政学专业,樊丽明承担了较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也为学科建设、带领专业梯队往前走承担起不少职责,也正是在这种教学实践中樊丽明不断夯实着个人的知识积累,不断探索着学术研究方向。到了 90 年代中期,樊丽明深感进一步深造学习的必要,于 1996—1999 年攻读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

“我从 9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税收问题,注重税收基本理论和重大制度变革的研究”,樊丽明说,“可能是受山大氛围的影响,我更为注重学习和研究基本理论问题。”她系统分析了 GDP 总量、统计的 GDP、可税 GDP、GDP 的产业结构等不同层次的 GDP 以及税收漏损率对税收数量的影响,详细阐述了税收调控与税收中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税收调控的局限;出版《税制优化研究》、《税收调控研究》、《税收法治研究》等研究专著、发表一系列论文,对税收相关基本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近来在研的国家税务总局课题亦是对税收结构变化的路径趋势的分析研究。不仅在税收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成果颇丰,樊丽明在地方财政运行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颇受人关注:她对地方财政收入制度和支出结构缺陷及成因,地方财政债务风险及防范等问题的分析,引起国内同行专家的广泛关注;以大量实地调查为基础,得出大口径税负过重、小口径税负偏轻的结论,研究清理规范收费以及“费改税”的改革思路,尤其就农村税费改革提出税费分流治理减轻负担的改革建议,专著《中国地方财政运行分析》也获得多项奖励。

公共品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是樊丽明近十多年来个人十分感兴趣也做出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对于公共品供给,她系统研究了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三种方式的运行机理、作用边界及相互关系,对中国公共品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进行了实证分析,而对于该领域研究的兴趣则源自博士后期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2000 年 11 月至 2003 年 5 月樊丽明在厦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 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5 月在美国杜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看了很多外文文献,受到很大触动,回来就投入到公共品领域的研究,一直到今天。”《中国公共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这本专著的出版便是以其博士后报告为基础形成。在博士后



出站报告评审会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邓子基教授、张馨教授、杨斌教授、邓力平教授、纪益成教授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报告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是国内学界关于准公共品供给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可以为我国当前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实践提供重要参考。是一篇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报告。”

在樊丽明看来,公共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大到可以解释国际组织,小到可以解释农村专业合作社,“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尽的国际责任从我们专业角度考量就是国际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公共品理论中的俱乐部产品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当中。”近年来樊丽明所做的很多课题研究亦是公共品理论不同层面的拓展延伸,包括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公共品理论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我也在不断引导我的学生进行相关研究”,樊丽明如是说。

学术理论研究的深入必然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从典型调查法到问卷调查法,樊丽明带领团队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在不断趋于规范,而注重实地调查及数据分析,是樊丽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直在握的有力工具,在同行眼中亦是具有“樊式”特色的研究方法。

回头来看,可能正是在学术殿堂不断攀登的选择为樊丽明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一路深耕细作奠定基础、提供动力。笔者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读博三年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北京全脱产读书,且此时的樊丽明已身兼山大经济学院副院长一职,女儿也在读小学;做博士后期间樊丽明已担任山大经济学院院长一职,在博士后做完的2003年暑期学校公开招选副校长时,她又以排序第一名的成绩到了山大副校长的职位,当笔者问及为什么在事业及家庭压力都较重的阶段一次次选择外出深造学习,且一次次在各方面又能取得了不起的成绩时,樊丽明给出这样的答案:“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有这种学习的冲动、觉得应该提高、觉得必须要充电了,就去学,不去学、知识是得不来的,这也感谢学校和家庭的理解支持。其他的就是要努力,努力就行了。”

成绩摆在那里,而答案再朴实不过。

走好事业与生活的“平衡木”

执教近三十年,从事院校教学管理工作也有二十余年,樊丽明说自己一直都是教学管理“双肩挑”的状态,从90年代初期担任山大经济系副主任到后来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管理学院事务,2003年9月任山大副校长后,分管教学、财务、文科科研、国际事务和合作发展等工作,直至如今上海财经大学的一校之长,对任何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说既是对其所做出成绩的肯定,又意味着更多责任的担当。

樊丽明认为,“双肩挑”就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你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管理中,自己的业务必然要放一放,这中间存在一个加减法的问题。比如我做副校长的时候,管理和研究教学工作时间分配上可能就五五开、甚至六四开,做了校长后用于管理的时间就更多。但这时候教学方面上课就不在多,上好为主;科研也不求多,根据兴趣和课题需要,做精就好。”

在山大担任副校长期间,由于山大本身体量大、副校长管理事务多,樊丽明可能今天在校主持会议、明天就飞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但她坚持每学期必须开一门课。到了假期,她就带着学生去各地调研、做课题,“尽管学校有很多工作,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名教师,这是我的本分,是我应该做也愿意做的。”在每周一次课的情况下,樊丽明会充分地利用与学生相处的时间,“从早上八点钟一上课跟学生在一起,到午餐时一定是我请学生吃饭,在学校食堂的包间里我们继续聊天。我喜欢这种氛围,也希望尽可能找机会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

在从事院校管理工作上,樊丽明也有自己的想法:“管理工作即为理公共之事、为大家工作,既然是为大家工作,又有什么不能跟大家沟通的呢?所以做管理工作最关键的就是坦诚沟通,与大家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才能最高效地解决问题。”

然而对于女性教育工作者而言,“双肩挑”不仅仅意味着教学与管理“双肩挑”,在很大程度上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难题。对于樊丽明这样一位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都做出斐然成绩的女性而言,其成功秘诀究竟何在?杨澜曾有篇名为《为事业、生活平衡支三招》的文章分享自己的心得,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建立明确的目标,以及建立家庭的支持系统”,樊丽明对此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亦有她自己更为丰富的认知、更为具体的努力、调整与平衡。

工作中的樊丽明专注、清晰、善于沟通、讲求合作,以服务之心、勤勉之力履行着其所应担当的职责:“有些职位我并不见得认为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一旦被选择,我就会尽职尽责,不做则已,一做就要做最负责的。”在樊丽明看来,更多社会责任和使命的担当,需要积跬步而以至千里的扎实付出,更需要敬业奉献精神,如何在事业和家庭间从容穿梭就需要在处理家庭关系中有一定的准则,唯有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相互信任理解的关系,才能以轻松饱满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一如前述杨澜所说“建立家庭的支持系统”对于职业女性的工作状态有着“根基式”的作用。樊丽明说她与先生都似“工作狂”一般,对于彼此的工作相互理解、尊重与支持,女儿从小到大也很懂事、独立,“所以历来我把我们家三口的关系比作‘相交但不重合的圆’,‘相交’是因为一家人有共同的理念和生活,但每个人亦有其独立的一面、有各自紧张忙碌且丰富的生活。”而每天晚上回到家后看看电视、洗洗衣服便成为樊丽明工作之外“奢侈”的休闲……



与美国韦伯斯特大学 Elizabeth J. Stroble 校长亲切交流

要带着一份感情来做教育

“新学校,新同事,新城市”,2012年7月份樊丽明履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一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不小的转折”。与山大这所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相比,上海财经大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多科性学校,其规模、文化、得到的支持以及在当地的影响等都与山大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到上财工作要告别共事已久的同事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一切要从头开始,重新适应。甫一上任,樊丽明选择的是从调查研究开始,通过走访调研各个学院以尽快熟悉学校的情况,了解自己工作的基础和对象,亦促进其与新同事间的相互了解。“调研是一方面,而在管理学校大的层面我的想法是坚守传统、开拓创新。上财是一所近百年的老校,有着优质的专业教育以及广泛的社会认同,因此好的传统我们要进一步坚持,在此基础上认准方向、开拓创新,才能让我们的学校办得更好”,樊丽明如是说。

认真调研、仔细论证、大胆推进是作为校长的樊丽明在开展工作中的理念和原则。“一项工作,经过调研论证明确方向、达成共识后,就要有抓手有保障有措施地大力去推”,樊丽明说道,并向笔者进一步举例——

在国际化方面,除了坚持“常任轨”、外聘院长等制度,提升合作学校层次、增加学生海外学习



在金融学院调研指导



率团访问香港大学



与 2013 届毕业生合影留念

机会、统筹规划管理人员境外培训等力求建立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国际化也是学校正在大力推进的工作之一,樊丽明也亲自参与其中,多次到海外、港台去交流、联系。

2012 年,随着校董会的成立,学校增加“合作发展处”这一职能部门,搭建起校友会、校董会、教育基金会“三会合一”的发展平台,致力于“三会”联动机制的建立,整合校内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也使得各类资源更好地服务学校发展。“这也是我们学校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方面新的探索”。

此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新一轮本科生教育改革、人才方面的“引培结合”等都在不断酝酿稳步推进中。

采访中,樊丽明向笔者阐述了她对上海财经大学建设“具有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一目标的理解以及如何将目标具体化,如何找准抓手、规划好每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工作思路,彰显出一个现代大学掌舵者的远见与魄力。而当谈及个人的办学理念时,女性教育工作者理性与感性思维交织出的智慧、气度与对教育事业的真挚情感则展现无余——

樊丽明秉持“用大学的理念办财经”这一想法,认为大学就是要为学生制造一种氛围、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提供多种经历和选择,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来培养人,“不能只算经济账而丢了教育的本质”;她坚信“一所学校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就在于“关爱学生”是否做到位;她组织制定了“2013 关爱学生十大措施”,从增加通识课的品种、举办高水平的人文艺术和科学讲座,到办好食堂、门诊部、图书馆延时开放、修建灯光球场、自修室进宿舍楼等等,就是想在“关爱学生”的理念下不断创造条件、一点点为服务学生成长作“持续改进”。

“试想一下,要是坚持十年,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服务会到什么程度?”樊丽明校长反问道,“所以办学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富有爱心,因为教育就是爱。要带着一份感情来做这个工作!”

镜头又拉回上海财经大学 2013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樊丽明校长亲自为 3610 名毕业生逐一颁发证书并亲切地与每一位毕业生合影留念,这位满心热爱教育事业的校长在上海财经大学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收获……■

(采访录音由实习编辑邬晓雅整理)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

记者手记:

采访了不少大家,感悟良多。“大家”自身的谦逊、勤勉以及钻研精神等自不必多说。我个人还有一点想法即为越是成绩突出的学者,其归纳总结能力越强,不论在学术研究、教学管理方面,还是在个人经历和自我认知层面,善于归纳、勤于总结是这些“大家”普遍表现出来的一种素质,这既离不开长久养成的理性分析、科学对比的思维习惯,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能力和胸怀。采访樊丽明校长这种感触尤为深刻。樊校长对于我所提的问题都条理清晰地作出归纳总结,不时地闪耀金句,其思维的准确度和反映的灵敏度令我印象颇深。且其始终都在强调女性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优势以及其自身对于生活经历和所处时代的感恩,这种心态的平和、处世的积极也在感染着我。而采访间更多的是樊丽明校长那份“我太爱教育”的直抒胸臆,让我感受到她爽朗大气的性格同时也撰写下本文稍显直白但不失准确的题目。尽管我还有一些问题诸如对于女性领导力的看法、履新一年的压力和困惑等等由于时间关系并未深入交流,但樊校长似乎以其言谈举止间散发出的“正能量”已然告诉我答案——那份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幸福感会让她如同一棵有着扎实根基且找到适宜土壤的大树,凭借那股向上的力量在这方土地尽情生长。